

技术与人文

□ 米川

技术是人类的存在形式,是现代人的历史命运。人类在不断创造技术人工物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把自身也带入了一个技术化社会。

回望过去三百余年人类发生的四次工业革命历程,人文主义的技术批判如影随形。在人文主义看来,技术并非是中性的,而是价值负载的,具有丰富的价值观、伦理与政治意蕴。现代技术与科学已经取代传统的神话和宗教而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一种控制的新形式。技术不仅是一种解放的力量,而且是问题之源。技术本身是有意义的,但人的意义不能由技术来决定。

人文主义是一种集群概念,包括古典人文主义、浪漫主义人文主义、非理性主义人文主义、现代非理性主义人文主义以及新人文主义、数字人文主义。从第一次机器时代到第二次机器时代,人文主义就技术与人、自然和社会的关系及人类命运表现了深度的学理关切。从卢梭的“道德沦丧”、帕斯卡尔的“心灵的逻辑”、席勒的“机器轮盘”到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尼采的“权力意志”和狄尔泰的“生命哲学”;从芒福德“巨机器”、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哈贝马斯的“旨趣”、弗洛姆的“技术的人道化”到韦伯的“现代的铁笼”和海德格尔的“座架”、福柯的“圆形监狱”以及埃吕尔的“技术自主”等等不一而足。归结起来,人文主义反对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理性,他们对技术批判的理论向度或根本旨趣是弘扬驾驭技术理性的价值理性。

纵观人类历次由技术驱动的文明大变局,无不存在“技术逻辑和人文逻辑,或技治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对垒”的规律。比如,在技术升维和技能降维阶段,技术逻辑注重的是对其他文明降维打击的能力和利益,更多的是强化设计者与应用者之间技术不对等关系的升维,

强化不透明的技术单盲性基本操作和对应用后果不做解释的愚民性被动技术消费行为;而人文逻辑则主张保障所有人获得新技术的机会,生活在同一认知时空域和文明地平线,使所有民众懂基本技能、基本原理和合乎伦理地应用技术。技术逻辑产生的忧患曾预言性地体现在奥威尔的《1984》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

人文主义价值观导向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其成立宗旨和发布的系列报告无不鲜明地流布着“人文主义和新人文主义”的价值原则:“人既是发展的第一主角,又是发展的终极目标”。当下,以数字人文主义指导教育人工智能发展也已成为国际共识。

数字人文主义是探讨技术与人类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积极主动的方法,是人文主义引导的数字文明价值观的重塑。其核心是民主、包容、隐私和自由。

数字人文主义面对由“十字路口的数字技术”引发的人文问题比以往繁杂。如面对由生物工程技术 and AI 技术把人类的“身体自然”替代为“他者”而产生的后人类(主义)、后人文(主义),面对“AI 技术不透明、信息屏蔽与过滤、AI 控制者对历史信息处理偏差以及操纵信息”等等“AI 智障”现象,面对“后人类的赛博格性”和“后人类世的可能教育范式”,人文主义应该有怎样的思考指向、论域和旨趣?与智能体或人工物共处的新型主体性如何建构?共生主体性如何可能?人的终极价值意义究竟何在?人类能否走下“人类中心主义”的神坛?人类理应能统筹处理“目的-手段”关系,权衡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

技术与人文本质上是互塑或互构关系。技术是生产力,是伦理和意识形态,人文的加持是技术向善的根本保障。技术在进步,人文必更新。技术与人文是永续的对立统一。